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意识的变化

李晓红

(社会科学部)

摘 要

本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竞争出发，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独立、公正、协作、创新和开放的道德意识得到强化，同时论述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和成熟，自发、盲目、投机、功利和拜物等消极因素也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且指出了克除消极因素的措施。

关键词：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意识；公正；协作；创新；投机；功利；拜金主义

市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硕果，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经济与市场结合，确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超经济意义，它对人们道德意识的触及是深刻而久远的。

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使资源配置得更合理、更有效率，决策者就必须瞄准市场方向，掌握市场供求信息，努力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这种竞争说到底还是决策者——人之间的较量，它必然会给人们在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心理过程和观念即道德意识带来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新生也有阵痛，它们交织在一起，要求人们重新反思、评判和抉择，从而使人们道德意识水平得到提高。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纯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人们以下几方面的道德意识得到了强化。

首先，强化了独立的道德意识。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条条框框，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失去了充满个性的自我，把自我束缚在行政运行造成的各种公开的和变相的行政依附，这种行政依附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人身依附。

就人才流动而言，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流动不是件易事，要做到人尽其才就更不易。过去，提倡人们“干一行，爱一行”，（从敬业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也不否认有事业成功者）要

本文于1993年4月16日收到

求人们少流动。即使你想流动，也得有过五关斩六将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要求人们“爱一行，干一行”，人们根据市场的需求，寻找发展的机会，要求人才合理流动。流动是主人的自由，主人的追求，体现了主人的独立性而非依附性。

“文革”期间也有流动，如“红卫兵大串联”的流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流动，但这些都是行政命令之下的流动，是主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人身依附，不是人尽其才的流动。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人才交流中心难以计数，它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招聘人才，互通有无，扬长避短，合理配置。社会为主人的人身自由人格独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有利条件，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主人翁意识提高了，个人就会把社会的公益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充分发挥主人的聪明才智。

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苦一生，入土为安，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有强烈的依附心理。开放搞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台，中国农民浩浩荡荡从农村走了出来，涌向繁华的都市。据统计，1993年春运期间，我国流动民工总数达到5000万人，这预示着今日中国农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昔日牢牢钉在土地上的一根木桩，等待土地把他浸蚀，他们有追求功利、追求发展的自由，在他们思想中更多的是独立的道德意识。

主人的流动，使主人深深感到：自身中有价值的成分增多了，自我尊严的内容增多了，做人的权利增多了。

当然，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流动有许多难处，只有改革，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流动才成为易事。现在，有的机关干部“下海”，“一等二靠三摇摆”，担心“铁交椅”、“铁饭碗”丢了，没有依靠和安全感，成为机构改革的思想障碍。还有上级给下级放权、行政部门给企业松绑，下级和企业领导不会使用权利，就象刚离母乳的婴儿，不知所措，没有依赖感，真可谓“婆婆开明，小姑不贤”。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市场尚未成体系造成。只有改革，才能使人们的独立道德意识得到强化，从而淡化依附的道德心理。

其次，强化了公正的道德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秩序是公正竞争。“公正”就是公平、正大，机会均等，地位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强化了人们公正的道德意识，也必将淡化那些非市场关系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地位不平等尤其是特权的道德意识。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是“文革”时期乃至现在青年学生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只要有一个当官的爸爸，就可以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获得最佳的一切。“上山下乡”时可以参军，可入党，可提干；恢复大学招生时可以优先推荐甚至免试上大学，毕业可以分配好的工作单位。公正天平砝码搁置到了权力一方，造成机会和地位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唤来了公正的“包青天”，大学生分配、人才流动逐步纳入市场竞争机制，用人单位根据毕业生和人才的知识与能力择优录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童叟无欺，谁都可以去占领，优胜劣汰，没有地位的差异，机会特别青睐每一个敢于迎接市场竞争的人，对于自我封闭者或逃离竞争者是不受欢迎的。

公正与特权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忌讳特权。特权是破坏公正竞争的罪魁祸首，它使人们的道德堕落、沦丧。权力与市场嫁接，只能结出“腐败”的果子。以权私谋，贪污腐化是现象之一，当前，进出口许可证、批文、免税指标、低息贷款、房地产和股市交易等进入交换领域，给掌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留下了营私舞弊的机会。权钱交易是现象之二，它

主要是指通过接近各级掌握行政权力中心的人作中介,进行各取所需的交易,这个中介人就是权钱交易的掮客,权钱交易使“换饭碗”的改革走向了邪路。

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行政权力还或多或少地管制和干预市场,给官员种种特权。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规范、健全和成熟,腐败现象必定会大大减少。

第三,强化了互助协作的集体主义道德意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看起来似乎是“残酷”的,事实上竞争还有互助协作的一面。竞争不妨碍协作,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协作。只要我们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重视社会的宏观利益,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互助协作的集体主义道德意识必将得到强化。

优胜劣汰的事实,对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里的人们来说,容易造成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从“嫉妒”二字得到体现,以前我们所理解的“嫉妒”一般是“我不好,也不让你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们树立“你好,我比你更好”,大家团结奋进,共同前进的风尚。货比货不好可以扔,人比人不好未必死,见辱思亡,那是自然经济下的孱头行为。

现代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反映的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道德意识;“顾客就是上帝”才反映的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里的行为准则。

我们的市场经济既不同于早期自发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私人垄断市场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体、社会为本位是它的共同的道德标准,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道德意识必将在市场汪洋里淘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润和弘扬“雷锋精神”是统一的。“雷锋精神”如果返朴归真的话,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道德观。“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第四,强化了创新的道德意识。市场观念里的竞争迫切要求人们有领先意识,领先就要创造、革新;就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好我奇,人奇我新,人新我全”的不断创新的精神,就要有摒弃安贫乐道、固守陋习、满足现状和缺乏开拓的精神。

过去,由于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和“一大二公三纯”的计划体制的原因,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为天下先”等观念。业余爱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穿着时髦些被认为是不艰苦朴素;钻研科学文化知识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等等。这些规范和准则,抑制了个体的创新意识,失去了道德进步的动力。

如果说不是安徽凤阳几位农民敢为天下先,冒杀头危险的创新,或许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存在,至少晚几年存在;或许中国农民还在吃“大锅饭”,就不会有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泽民说,十四年改革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就是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正在创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

只有创新,社会的发展才有生命力,人们的道德意识才日新月异,道德之树才常青。

只有创新,落后的腐朽的道德意识才会被摒弃,代之以积极的新生的道德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创新者提供了新契机,各行各业都在革故图新,开拓进取,创新的道德意识必定得到强化。

第五,强化了开放的道德意识。现代的市场已经打破民族、地域和国家的界线,成为一个统一的开放大市场,这就要求人们的视野面向大市场,走出家门、实验室门、走出国门。

历史已经证明,在民族问题上,“开放才兴,封闭则衰”。关闭国门,使我们的道德思想认识同人类的距离遥远了。我们坚守过“贫穷是社会主义”的信条;我们习惯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我们对“窝里斗”的人整人、人斗人的人际关系置若罔闻;知识分子在书斋里、实验室里言义不言利,表现出独有的清高;企业只安于关门生产,不面对市场需求;商人戴上了“无商不奸”的帽子,让人们小心地提防着;农民眼光局限于土地,没有勇气寻找另一片彩色的天地。

开放使人聪颖,闭塞使人愚钝。在个人问题上,封闭容易导致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他人和集体。胜利了则夜郎自大,自命不凡;失败了则自我安慰,精神胜利。堵塞视听,自我封闭只能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狭隘,不利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当然,开放并非易事,但开放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已家喻户晓,“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已妇孺皆知。只有开放,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才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有开放,才有比较,才知落后,才会奋起直追。

2

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是万能的,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面”。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体制根深蒂固,市场机制尚不规范,这些弱点和消极面必定对人们的道德意识产生消极作用。

首先,过渡期的市场有一定自发性。市场谁都可以去占领,善的恶的,美的丑的,真的假的一起进入市场,对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国人来说是很难判断识别的,这就必然会对本来就较弱小的新道德意识起负作用。

其次,转型期的市场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发生作用,当我们与“看不见的手”握手时必然有很大的主观盲目性。目前,有的干部赶“潮”下“海”,别人挤商贸一条街,他也跟着挤,结果破了墙办不成店;搞开发区、招商引资、房地产和股票交易一哄而起,凭一腔热情;人员流动都流向沿海开放城市,给这些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等等。这些盲目性,使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滋生,沉渣泛起,对人们的道德意识产生不良影响。

再次,目前的市场有一定投机性。“投机”一词在英文中是 speculate,本身具有“推测”、“预测”之意,是中性词。但是,目前由于市场还未走向规范,法制尚未健全,给投机者可乘之机,以牺牲法律和道德为代价,来换取利润的增殖。

我们承认“买空卖空”的经纪人或“皮包公司”对市场商品流通有无可辩驳的价值,但若不是传递信息,提供服务,而是倒卖合同,倒卖进出口许可证,欺压客户,招摇撞骗,这就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行为。我们承认炒买炒卖股票对投资起了积极作用,但坚决反对“以公谋私”拿公家的钱当本金,炒股赚得的利润上自己的腰包,把股份制的“经”念歪来的做法。

第四,市场竞争有强烈的功利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追求功利是市场竞争内在必然要求。但这种追求是以不妨碍他人,不损害集体和社会利益为前提。应该是“君子言利但不谋私”,“君子言财但取之有道”,而不应见利亡义,唯利是图。

目前,损公肥私、贪污腐化、假冒伪劣、短期行为等功利行为激化了个人同他人、集体

和社会之间利益的冲突,使人们的思想产生困惑,对人们的道德意识起了消极作用。

第五,不健全的市场存在拜物性。这种拜物性目前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商品交换的市场靠“物——货币(金钱)”关系维系的。本来物质利益和金钱都是人手的产物,而人们却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把它看作一种支配人的命运,左右人生幸福的神秘力量,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金钱化,视金钱若神明,从而导致拜金主义,拜金主义不能不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大滑坡。

以上消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克除人们思想中消极的道德意识。

第一,继承计划经济体制里优良的道德传统。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并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的一切道德意识,而是革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消极、落后的道德意识。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离不开继承,采取否定一切道德意识是道德虚无主义。为什么人们面对消极社会道德意识抬头会留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道德状况呢?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有多优良道德传统值得人们去回忆。

第二,加快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道德意识的消极因素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过渡时期的不定型所造成的。市场发育不完善,法规、法律不配套,给一些腐败、堕落者有机可乘。只有建立一套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增强人们提高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利用法律的武器,才会使人们行为更具合法性,减少动机的不道德性。

第三,树立道德理想,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并不是被动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而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为道德意识与社会存在不一致性,即道德意识具有超前性。道德意识中包括理想成分,这种道德理想具有超前于社会现实道德的特性,只有道德意识指向未来,社会道德才会进步,否则道德就失去了它的本意,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尽管社会现实存在“见利亡义”、“唯利是图”、“腐败堕落”、“拜金主义”等消极道德意识,但只有树立道德理想,通过道德典型,用榜样和示范的力量使人们追求理想人格,或通过一定的道德论证,用理性的力量,提高人们的道德认知,培养人们道德情感,锻炼人们的道德意志,使人们树立积极的道德信念,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只有这样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之间的差距才会缩小,从而接近或达到道德理想的彼岸,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在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必定会唤来美丽的“莱拉尔小姐”——道德姑娘,必将使国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4, 23, 39
- [2] 市场经济与雷锋精神两难选择吗. 中国青年报, 1993; 3, 2 第三版
- [3] 周春等. 学者谈市经济与商品经济. 大学生, 1993; (1): 32
- [4] 杨清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超经济价值. 工人日报, 1992, 11, 27
- [5] 史仲文. 猛醒的中国.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2; 44, 45